



开放科学
(资源服务)
标识码
(OSID)

面向政府科学决策的现代智库：现存困境、未来愿景及路径建构

徐晓明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科研部 北京 100091

摘要： 高效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已经成为国家现代治理的关键问题。当前，转变政府决策的传统惯性给现代智库提出巨大挑战，我国的智库建设存在高端供给不足和低端服务过剩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孤岛式决策支持模式桎梏着多源汇智等机制性矛盾。对标现代高质量智库的多学科智库团队集智攻关、科研成果二次再造转化、重大决策全链条跟踪研究等主要特征，构建了融合多学科领域与多主体利益的智库成果咨政机制，以期为以新理念、新标准、新技术驱动我国智库高质量发展有所益助。

关键词： 智库建设；决策科学化；信息化技术；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 G35

Modern Think Tank for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in Government: Existing Dilemmas, Future Vision and Path Construction

XU Xiaoming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Efficiently promoting the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scientifically has become a key issue in the country's modern governance. At prese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inertia of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poses a huge challenge to modern think tanks. There ar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ink tanks in my country, such as inadequate high-end supply and low-end service oversupply, as well as the island-style decision support model, which encumbers multiple sources of wisdom and other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s. For benchmarking modern think tanks, the multidisciplinary think tank team need to integrate intellectual research, the refin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as well as the full-chain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京津冀城市群‘区域治理一体化’模式构建与推进路径研究(20BJY064)；“建设服务型政府研究”(17VZL014)。

作者简介： 徐晓明(1979-)，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区域经济，E-mail: xxm51@163.com。

tracking research of major decision-making. Furthermore, this paper builds a think tank achievement consultation mechanism that integrates the interests of multi-disciplinary fields and multi-sectors. It is helpful to driv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think tanks with new ideas, new standards and new technologies.

Keywords: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ath

引言

当前,国家正在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现代化已经与产业现代化、技术现代化等成为国家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不仅仅局限于政府,还应包括政府之外的行政主体,如社会、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国家或区域治理之中^[1]。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意味着需要转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单向政府管理理念,充分发挥社会多元主体广泛参与治理的作用,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协同治理理念。现阶段,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程度已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标,科学化导向是核心、民主化导向是基础、法制化导向是保证^[2]。其中决策科学化是决策民主化、法制化的前提,唯有科学决策才能保证民主决策、法治决策的有效实现。

智库又称为思想库,是一种以影响科学决策为目的、专门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机构^[3]。美国智库专家麦甘认为,智库等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的作用是对国家、企业等管理制度进行决策性指导与分析,对处理方案实施进一步核实,给予决策层有价值的信息供其参考进而做出决策^[4]。在我国,新型智库的培育和建设,主要发挥建言资政、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

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智库以高水平人才和高质量成果对国家决策的资政辅政。

作为政府“外脑”,智库要审时度势聚焦大局大事,夯实前瞻性、战略性、综合性的研究储备,以智力资源提高谋划辅助政府决策。具体而言,在服务决策需求上,智库研究不仅要具备“想政府之所想,解决策之所需”的善谋本领,还要不断强化“想政府之所未想,解决策之所未需”的远谋能力^[5]。为了坚持有效服务政府科学决策的高标准定位,智库建设应从决策需求出发,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以研究能力为核心,着力提升决策咨询水平。同时,需要智库协调好面向多元主体参与决策的交互关系(如图1),与决策部门建立“谋”与“策”的互动,为“策”筹“谋”,出“谋划”策”;并深入社会实践关注社情民情、解读回应大众关切,充分发挥好政府与社会交互的连接桥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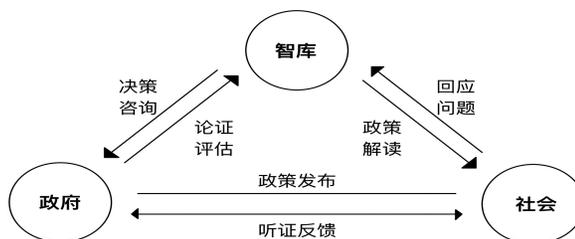


图1 多元决策主体参与决策的交互关系

1 我国智库辅助政府决策现存困境剖析

1.1 从特性维度看，转变政府决策的传统惯性给现代智库提出巨大挑战

随着国家各项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政府决策的科学水平得到逐步提高，但限于传统惯性仍有部分政府决策具有以下特征：（1）主观性，部分决策主要依据政府领导的个人经验、能力与素质，甚至个人偏好来决定某一事项在决策中的重要排序。（2）短时性，部分决策可能暂时具有很好的短期效益，但这或许是以牺牲长期利益或透支未来发展为代价的选择。（3）应急性，部分决策停留在“头疼医头”的应急事件的解决层面，甚至出现“病急乱投医”的现象。（4）功利性，在某些不良晋升文化影响下，一些官员表现出功利性的决策观，甚至有些决策出现“只唯上，不唯实”的现象。（5）无序性，部分决策忽视决策过程中的论证、听证等必要程序，公共信息不对称性导致缺乏公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从决策机制本质上看，政府决策官员的传统思维惯性，其本身“科学化决策”意识淡薄，外部缺乏制度化的刚性约束，以及决策信息和咨询建议不畅通，多主体参与决策和决策评估机制不完善，决策监督和问责机制不成熟等，均导致了政府决策的失准和偏差等科学性问题，进而影响了决策的实施效果。

1.2 从供需结构看，智库高端供给不足与低端服务过剩的矛盾日益凸显

近年来，国家围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制定了一系列培育政策和激励措施，全国掀起智库建设热潮，短时期内涌现出一大批良莠不齐的各种类型的智库。比较西方智库，我国现有的智库大多脱胎于传统科研院所，具有浓厚的传统科研色彩；部分智库仍停留在学术性研究的原状，研究成果对政府决策支持的辅助有限，总体呈现出高端供给不足和低端供给过剩的结构性矛盾。分析其原因，一方面限于没有足够的实践和调研，学者对现实中相关问题的理解与把握深度不足；另一方面学者们对政府决策程序、决策机制不熟悉，导致所提供的研究从理论到理论成果的多，可实施的对策建议少，无法形成国家决策所迫切需求的智慧支持，甚至出现“有智库之名无智库之实”的极端现象。

当下，我国加强政府决策科学化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日益增加的决策需求与智库研究支持不足之间的矛盾，出现“智库建设热”而“决策支持少”的现象。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组（TTCSP）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8》显示，2018年中国智库数量达507家，位居全球第三（见表1-3）^[6]，但入选全球智库百强榜单的却寥寥无几且排名靠后，这与我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大国地位明显不符。部分智库着眼于“手边事”“眼前事”“热点事”，更多停留在政策解读层面，缺乏对重大问题和主要矛盾的深入调研与思考，真正做到靠近决策、影响决策的智库数量较少，决策咨询研究“不解渴”“不到位”情况普遍存在。这种现象严重背离国家赋予智库服务科学民主决策的职责，也没能践行辅政资政这一重要使命下智库所应担负的发展定位与价值目标。

表 1 2018-2019 年全球及各大洲智库数据对比

	2018年		2019年	
	数量 (家)	占比 (%)	数量 (家)	占比 (%)
全球	8162	100%	8248	100%
欧洲	2219	27.2%	2219	26.9%
北美	1972	24.2%	2058	25.0%
亚洲	1829	22.4%	1829	22.2%
中南美洲	1023	12.5%	1023	12.4%
撒哈拉以南非洲	612	7.5%	612	7.4%
中东和北非	507	6.2%	507	6.1%

数据来源:《全球智库报告 2018》《全球智库报告 2019》(数量单位:家)

表 2 2017-2018 年年全球智库排名对比

排名	2017年		2018年	
	国家	数量 (家)	国家	数量 (家)
1	美国	1872	美国	1871
2	中国	512	印度	509
3	英国	311	中国	507
4	印度	444	英国	321
5	阿根廷	225	阿根廷	227
6	德国	214	德国	218
7	法国	197	俄罗斯	215
8	日本	116	法国	203
9	俄罗斯	103	日本	128
10	加拿大	100	意大利	114

数据来源:《全球智库报告 2017》《全球智库报告 2018》(数量单位:家)

表 3 2017-2019 年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单中上榜中国智库及其排名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智库名称	排名	智库名称	排名	智库名称	排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CICIR)	29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CICIR)	3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CICIR)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 (CASS)	38	中国社会科学院 (CASS)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 (CASS)	38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CIIS)	49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CIIS)	5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CIIS)	5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	57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	6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	56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IISS)	78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IISS)	81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	58
全球化智库 (CCG)	91	全球化智库 (CCG)	94	全球化智库 (CCG)	76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SIIS)	93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SIIS)	96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IISS)	81

数据来源:《全球智库报告 2017》《全球智库报告 2018》《全球智库报告 2019》

1.3 从服务机制看，孤岛式决策支持模式桎梏着多源汇智

与西方不同，我国智库建设起步晚发展慢，智库研究多以单一学科带头人或小型团队为主，一般聚焦于某个问题的某一个方面，研究广度和深度受限于团队的有限力量。从全国来看，这种“小而散”的研究模式是大多数智库机构的常态化现状。这种模式带来两个问题：一方面研究主题较为分散，不易形成合力；另一方面不同智库之间甚至同一智库内部的不同学者或研究团队之间彼此封闭，缺少跨学科沟通、跨部门大团队协作的“联智”研究，进而导致国家或社会科研经费支持了数量众多且分散的小课题研究，产生了大量研究不精深不透彻的成果，缺乏真正可以影响决策或有较大决策贡献的精品力作。

当然，由于现行的政府信息共享机制不成熟，公共决策程序不健全，购买咨询服务机制不完善等制度性限制，也加剧了政府与智库之间缺乏稳定沟通和良性互动，一些有价值的咨询成果缺少有效渠道没有机会转化为政府决策，一些迫切需要咨询的决策难题又找不到智库研究的支持。如何改革与完善智库研究成果转化为高效服务的决策咨询机制是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过程中重要环节和必要保障^[7]。

2 政府科学决策驱动智库高质量发展

全球化背景下，为更好适应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新要求，从国家到地方一揽子重大决策需要强大的智力资源深入开展分析研

判，一系列发展道路上的重大决策难题需要破解（如图2）。建设和发展我国智库，要立足自身，切实提高决策研究能力，同时集多学科专家的群智优势，吸引决策经验丰富的人才对研究成果二次再造，形成切实可行的决策方案。同时，把智库咨政建言以必要程序贯穿到政府决策前、决策中、决策后的全链条中，增强决策合理度和公信力，有效服务好国家和政府战略大局，充分发挥智库辅助决策支持的价值效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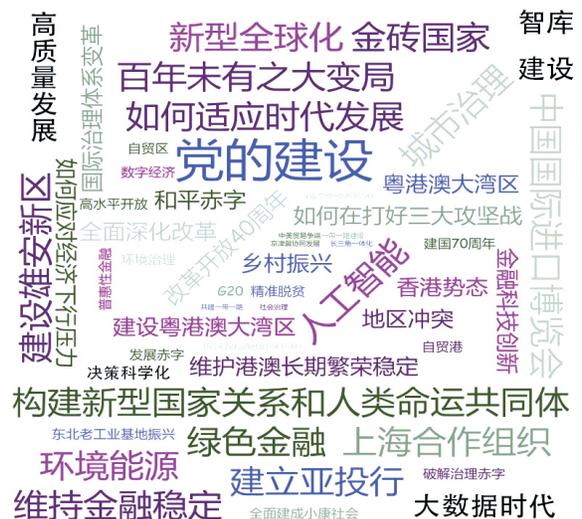


图2 2018-2019年智库重大决策研究选题热词

2.1 协同研究：决策问题的复杂性要求多学科智库团队集智攻关

面向政府科学决策的智库研究，依靠单一智库或单一学科背景团队较难全面把握现实情况的新变化新矛盾，难以提出切实可行的决策建议^[8]，需要组建多学科团队，调动集中各方优势力量，群智群策开展联合研究（见图3）。如果政策研究能力有限或者研究不够深入透彻，仅仅考虑某个片面的问题而缺乏整体风险评估，

很可能导致一系列次生问题，严重影响政策的有效性，甚至不得不对政策进行调整，不仅增加了决策成本，还影响了政府决策的权威性^[9]。

协同研究中，多学科团队并非处于并列关系，研究成果也并非简单组合或拼盘，而是从不同维度、不同视角出发，围绕某个问题的跨学科研究，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政策建议的切磋争鸣、充分研讨^[10]。比较现有部分智库的单学科研究范式，整合多学科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最终形成可实施的具体政策建议，而是当某个领域的专家针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后给出政策建议时，其他学科领域专家围绕该政策建议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论证、评估和预判。最终，提交给决策部门的不是一个孤立而简单的政策建议，而是多个情景下菜单式的一揽子方案，以供政府决策综合参考。同时，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智库间应加强沟通联动，以交流、合作、共建的形式，拓展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途径，营造有利于社会智库发展的良好环境^[11]，鼓励支持智库间信息共享，加强

多元化共建，形成智库系统研究合力。

2.2 二次再造：智库研究成果需要具有决策经验人员的再加工

现有智库研究成果，多以“内参”“专报”“特刊”等形式报送。限于智库专家学者的相对局限，如不熟悉政府决策机制、不了解不同决策部门的职责以及缺乏政策实施的实践经验等，智库研究成果对政府决策部门而言，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能直接作为决策或者政策落地。在现实过程中，政府某项决策或政策制度在出台前，需要征求并协调多个利益相关的行政管理部意见，由于不同管理部门利益冲突的客观存在，导致这个过程冗长且复杂。为提高决策支持的可用性，在现有智库研究成果提交之前，特别需要吸引、鼓励具有丰富政府决策经验的人才进行二次再加工，将研究成果改造为适合决策应用的政策建议或方案（见图3）。这种二次加工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将政府对不同利益方的协调进行前置，以此降低后期决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交易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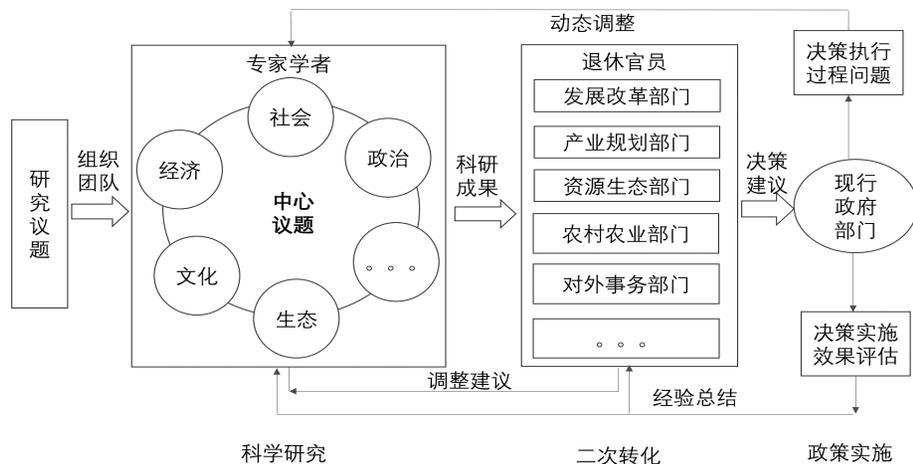


图3 智库科研支持政府决策过程框架图

西方发达国家一流智库的影响力较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不仅具有较高水平的专家学者，还拥有一大批具有丰富政府工作经验的退休政要和官员，例如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大部分由政府政要或离职高官组成，这种成熟的“旋转门”机制，有效引导智库与政府人才有序流动^[12]。但对于我国智库建设而言，一方面智库专业人才相对短缺，另一方面又存在绝对人才浪费的现象，尤其是熟悉决策实践的政府离退休行政管理人才资源没能得到很好的开发。部分高水平离退休人员怀有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建言献策的积极性，但因缺乏畅通而稳定的渠道无法参与到智库研究中去。因此，应探索以“返聘”“特聘”等形式吸引部分行政人才加入智库建设队伍，根据这些特殊人才的决策经验以及相关利益方的预判^[13]，可以对专家研究的成果乃至研究方法提出决策反馈建议，进一步激发、引导专家学者的咨询研究重点，共同完善相关政策建议，提高智库研究成果的转化率和有效性。

2.3 全程跟踪：国家重大决策需要高质量智库团队长期跟踪参与

现有部分智库喜欢讨论热点问题，部分学院派的研究成果以获得领导批示为决策研究完成标准，这种“选择主题-开展研究-成果上报”短平快的资政形式，由于缺少经验丰富、专业性强的“高智”团队长期跟踪某一个领域开展全方位、系统性战略观察和实践调研，导致对国家重大决策的前瞻性、预判性不足、战略高度不够。当现实迫切需要某项重大决策服务时，数量众多的智库无力给出有针对性的、切实可

行的政策建议。因此，面向国家重大决策的智库，需要智库专业团队长期持续跟踪决策研究，需要坐得住“冷板凳”进行“冷思考”。

面向政府科学决策的智库建设，需要一支高质量的智库团队协同长期跟踪某项决策的全链条：（1）决策制定：组建团队，通过文献研读与深入实地调查，发现、收集并明晰涉及决策各方面要素信息，选择合适的模型工具，分析决策的理论依据、法规依据与现实依据，进行不同决策方案的比较研究^[14]。过程中尤其需要对决策执行的各种风险，包括带来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进行评估预测，以期降低决策的执行成本等。（2）决策执行：智库跟踪决策过程中应采取有效手段配合相关管理部门对决策实施进行相关背景与意义目标的解读，统一各方思想认识是决策快速落地的有效方式；研究各方反馈，分析决策执行中的各种问题，适时动态修正或调整原有的决策建议。（3）决策评估：选择各类指标度量决策前后的现实变化，并将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进行比较，全面评估决策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包括决策带来的正面或负面外部溢出效应^[15]，进而总结决策研究的经验教训，为提高未来决策的科学性与公信力积累研究的实践依据。

3 科学谋划我国现代智库建设路径

为满足科学、准确、高效的政府决策需求，在遵循智库发展规律和掌握决策科技方法的基础上，智库建设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组织建设，将科学研究的质量要素和决策影响的能力要素有机结合，对内探索创新灵活高效的智

库运行体制机制，对外通过设计合理的第三方智库综合决策评价指标体系力求“以评促建”，并创新运用大数据信息化科技方法，推动政府决策部门重视智库、善用智库，支持智库建设长效发展路径。

3.1 完善智库决策支持的外部与内部组织建设

为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水平，需要进一步完善智库专家参与政府重大决策咨询作为决策的必经程序加以规范。组织专家以调查研究、征询意见、听证论证、起草文件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咨询，参与决策全过程的决策前论证，决策中风险评估、决策后效果评估等制度化推进，充分发挥专家在决策中参谋助手的作用。探索试行决策部门以招标或定向委托的形式购买智库决策咨询服务，以此拓宽智库辅助决策的合理、规范、有序的渠道。重视社会智库公开、平等参与政府决策的合理性、合法性保障，

在社会上营造信任智库、重视智库健康发展的良好外部生态。

确保智库发挥决策支持效能最大化，政府应成立“综合决策领导小组”（下称领导小组）、智库成立“决策专家委员会”（下称委员会），领导小组引导协调智库委员会，优化智库参与决策的直接、高效组织架构（见图4）。领导小组机制，不仅应具有议事协调职能，而且还有决策、执行、监督等职能^[16]。专家委员会不仅需要吸纳全社会各领域优秀专家团队投入到决策咨询队伍中去，而且还需要具备政府决策运行经验的行政人才，从多个视角参与决策全链条关键环节，以保证决策最大程度地体现民情、民意、民生^[17]。通过委员会对智库建设和总体运行进行部署指导，提出智库中长期发展规划，强化智库专家与决策部门的供需精准对接，及时开展重要决策课题研究，组织一系列智库参与决策咨询的活动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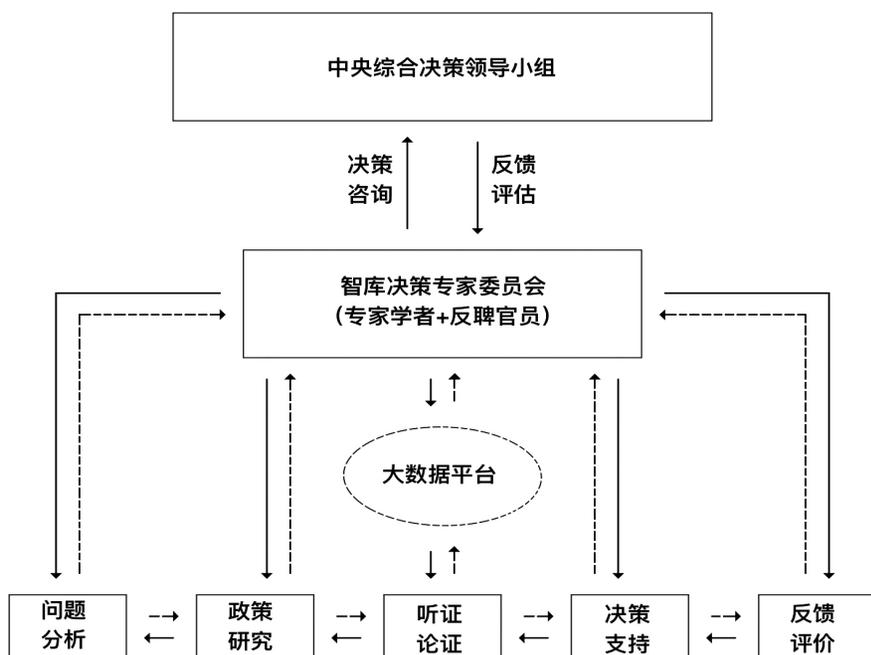


图4 综合决策领导小组架构

3.2 创新灵活高效的智库运行体制机制

改革创新智库内部治理机制。科学规范的运行机制是智库产出高质量决策成果、培育优秀团队的重要保障。优化健全以决策咨询为导向、以专家团队为核心、以决策任务为纽带的一体化内部治理和运行机制，改革有别于传统固化的科研管理机制，重点在研究经费、选题立项、组织人事等方面制定实施细则和配套办法以确保智库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同时，加强政府扶持和经费支持，创新推行智库建立基金制度，鼓励更多社会组织支持智库建设，多渠道多元化筹集智库研究经费，确保投入智库建设资金充足。推动落实科研“放管服”改革，切实赋予智库和研究人员更大的主动权和自由度，释放智库研究潜力，调动决策研究创造力，探索建立充分发挥决策咨询研究能力的长效机制。

健全完善决策成果转化与推广机制。应紧紧抓住成果转化这个“牛鼻子”，创新有利于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破除不利于成果转化的瓶颈束缚^[18]。不以成果获得批示为最终标准，建立研究成果转化应用及跟踪激励机制。拓展智库成果的国内外需求空间，通过正反馈效应激发不同智库间研究成果竞争力的提升，进而整体提升智库成果的转化推广^[19]。尤其要重视对智库系列报告或成果以持续发布会的形式宣介，实现决策成果面向社会化、大众化普及推广，扩大智库影响的社会效益。鼓励智库专家在主流媒体上对相关决策积极发声，回应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使决策主体、主流媒体和智库三方凝聚更多的决策共识。

3.3 强化智库发挥决策效能的第三方评估

智库的存在价值即是对社会公共政策和决策产生影响，因而设计组织好对智库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的综合评价是加强智库建设的重要议题^[20]。本着“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的原则，应鼓励第三方评估机构依据决策贡献、学术影响和社会声誉等方面对智库机构提供的决策效能进行综合性评估。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应充分考虑各类智库在组织机构、发展定位、人才队伍、研究领域等关键要素的差异化，不宜采用统一标准的“一刀切”模式，应重点关注咨政辅政的核心职能，强化决策成果质量、突出决策贡献，鼓励智库立足自身特色发挥优势，积极探索创新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全球智库评价指数”（GGTTI）体系^[21]，从资源、效用、产出和影响四个维度，根据人才素质、决策成果数量和质量、决策影响力等28项考察指标对全球范围内智库进行全面评估^[22]。

对比国际智库评价，我国智库绩效考核与第三方评价研究方面在逐步加强，结合国际智库综合评价指标的考量，智库自身建设上应根据综合评级指标细化分解工作要点，将承担决策研究任务、参加的咨询活动、做出的决策贡献作为内部专家团队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探索成果多元化评价，尝试将内参等咨询成果等同为科研成果来等效使用，以此为抓手推动“教研咨一体化”建设，激发专家团队决策研究热情，促进更多科研成果的转化，鼓励更多学者尤其是青年骨干承担智库决策研究任务，充分释放专家学者参与决策的研究实力和研究潜力。

3.4 信息化技术为现代智库提供动力支撑

在当前互联网时代，数据是第一资源，信息是第一要素。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新技术为特征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资源要素的配置、组织运行方式和智库传统决策支持模式，表现为大数据创新驱动政府决策观念、决策结构和决策过程变革^[23]。利用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新的数据收集方法、人工智能等可以有效推动政策研究、提高决策质量^[24]。现代社会，需要将大规模数据分析、智能模拟等信息化技术手段充分应用到智库服务决策实践中，探索以数据源信息为支撑，创新政府的决策理念，补齐信息化这块重要决策拼图，从而大幅度降低社会治理成本，不断提升政府决策现代化水平。

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是信息化技术运用的必要保障。信息公开可以保障参与决策的政府、公众和社会组织等多个利益主体都能及时、平等获得充足的信息资讯。我国信息资源 80% 掌握在政府，政府是信息的最大拥有者，也是信息的最大服务者^[25]。智库要致力于唤醒政府“沉睡”大数据信息，做好信息公开共享，信息渠道建设是关键，应彻底打通政府大数据和社会大数据，畅通信息关联与共享，构建面向决策主体，面向公众参与的大数据信息平台。同时，对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处理过滤，存储形成数据源，增强信息应用的后续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数据信息就是决策科学化的支撑，智库建设应以数据为起点，搭建大数据信息化-智库决策支持平台(如图5)，争取做到“向上有天线，向下有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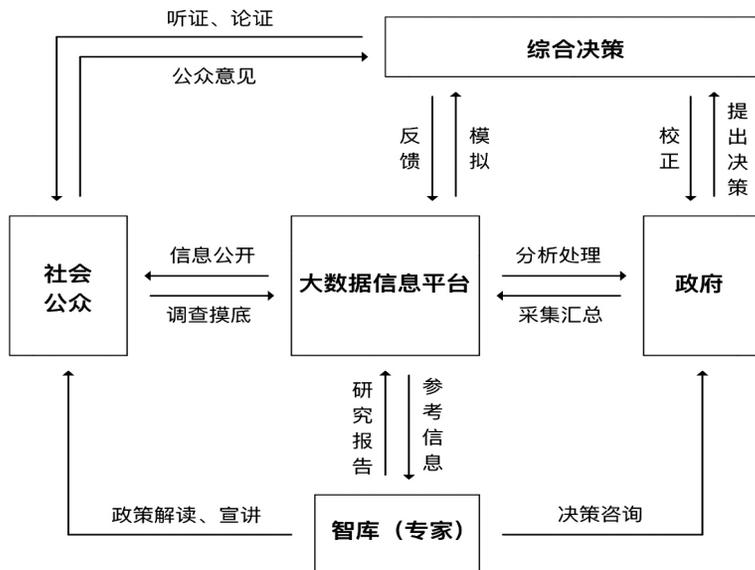


图5 大数据信息化-智库决策支持平台

信息化技术应用于智库辅助决策体系重点依托是构建大数据信息化平台，大数据平台可以快速实现数据的量化采集收集、数据汇总分析、可视化展示、智能生成报告等功能，为决

策部门的前期汇总、中期分析、后期呈现提供了系统的数据积累和一体化模拟。对数据源的处理和分析是智库服务决策准确与否的源头因素^[26]，构建主要包括数据存储分析系统、智能

模拟系统、决策监督系统、决策反馈评估等大数据信息分析处理一体化综合决策支持系统，进而充分发挥数据智能化分析处理作用，将事后补救转变为事前预警，从源头上避免政府传统决策中主观性、功利性、盲目性等问题。

4 结语

创新智库研究机制进而提高智库建设水平，对推动科学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现阶段，我国智库建设存在高端供给不足和低端供给过剩的结构性矛盾，对政府决策的有效支持力度严重不足。为进一步适应政府科学决策的需要，现有智库研究模式应该实现三大转变：从单一学科孤岛式研究向多学科智库团队集智攻关、从直接提供科研学术成果向经由决策经验丰富人员的二次加工转化，以及从某个环节的断点式研究向包括决策制定、执行过程与后评估等多阶段全链条的长期跟踪研究转变。同时，应创新符合智库发展规律的灵活高效的现代治理运行机制，完善决策成果转化推广机制，积极推进智库建设的第三方评估，并充分运用大数据信息化技术构建大数据智库决策支持平台。最终，以思想建库，以制度治库，以高质量成果资政辅政，不断增强智库的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使智库成为提升政府科学决策并推动决策现代化的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 [1] 格里·斯托克, 华夏风. 作为理论的治理: 五个论点[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1999(5).
- [2] 代全川, 范云峰. 论地方政府决策体制的失范与重构[J]. 甘肃社会科学, 2006(5):151-153.
- [3] CGD. Measuring think tank performance: An index of public profile [EB/OL]. [2013-06-28]. http://www.cgdev.org/sites/default/files/think-tank-index_0_0.pdf.
- [4] James G. Mc Gann, Think Tanks and Policy Advice in the United States[M]. Routledge, 2007.
- [5] 徐晓明. 引导智库进一步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 2019-05-29(05).
- [6] 人民网. 《〈全球智库报告2018〉发布——2018年中国拥有507家智库位居世界第三》[EB/OL]. [2019-02-26]. <http://usa.people.com.cn/GB/n1/2019/0226/c241376-30903634.html>.
- [7] 张颖春. 中国咨询机构的政府决策咨询功能研究[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8:1.
- [8] 左雪松.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定位思考[J]. 情报杂志, 2018(6):33-39.
- [9] 梁健. 科学决策视阈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基于政府-智库-公众三方互动的思考[J]. 决策咨询, 2020(2):47-52.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EB/OL]. [2015-01-20]. http://www.gov.cn/xinwen/2015-01/20/content_2807126.htm.
- [11] 王栋. 社会智库参与政府决策: 功能、环境及机制[J]. 理论月刊, 2015(10):140-145.
- [12] 彭乔. 美国智库和智库外交[J]. 中国人大, 2010(21):50-52.
- [13] 张莉. 中国特色智库建设与决策科学化[J]. 决策咨询, 2019(2):21-25+29.
- [14] 隋映辉. 新型智库建设与决策科学化[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1):32-34.
- [15] 梁健. 科学决策视阈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基于政府-智库-公众三方互动的思考[J]. 决策咨询, 2020(2):47-52.
- [16] 周望. 中国“小组机制”研究[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
- [17] 王栋. 社会智库参与政府决策: 功能、环境及机制[J]. 学习月刊, 2015(10):40-45.

- [18] 余敏江. 加快特色新型高校智库成果转化的思考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7-09-30(02).
- [19] 杨万东. 构建激励机制提升智库成果转化效率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8-11-16(06).
- [20] 张志强, 苏娜. 国际智库发展趋势特点与我国新型智库建设 [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16, 1(1):9-23.
- [21] McGann J G. 200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index report [EB/OL]. [2008-12-01]. http://repository.upenn.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0&context=think_tanks.
- [22] McGann, J G. 2016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index report [EB/OL]. [2017-01-26]. http://repository.upenn.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11&context=think_tanks.
- [23] 何永松. 大数据驱动政府决策变革的前提、转向和关键 [J]. 行政科学论坛, 2019(6):29-33+35.
- [24] 搜狐网:《〈全球智库报告 2019〉发布——中国智库发展稳健上升》[EB/OL]. [2020-02-01]. https://www.sohu.com/a/369848920_828358.
- [25] 樊钉. 政府决策能力现代化 [M].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6.
- [26] 李梦禹. 大数据技术辅助下政府决策的优势分析及发展建议 [J]. 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9(6):195-196.